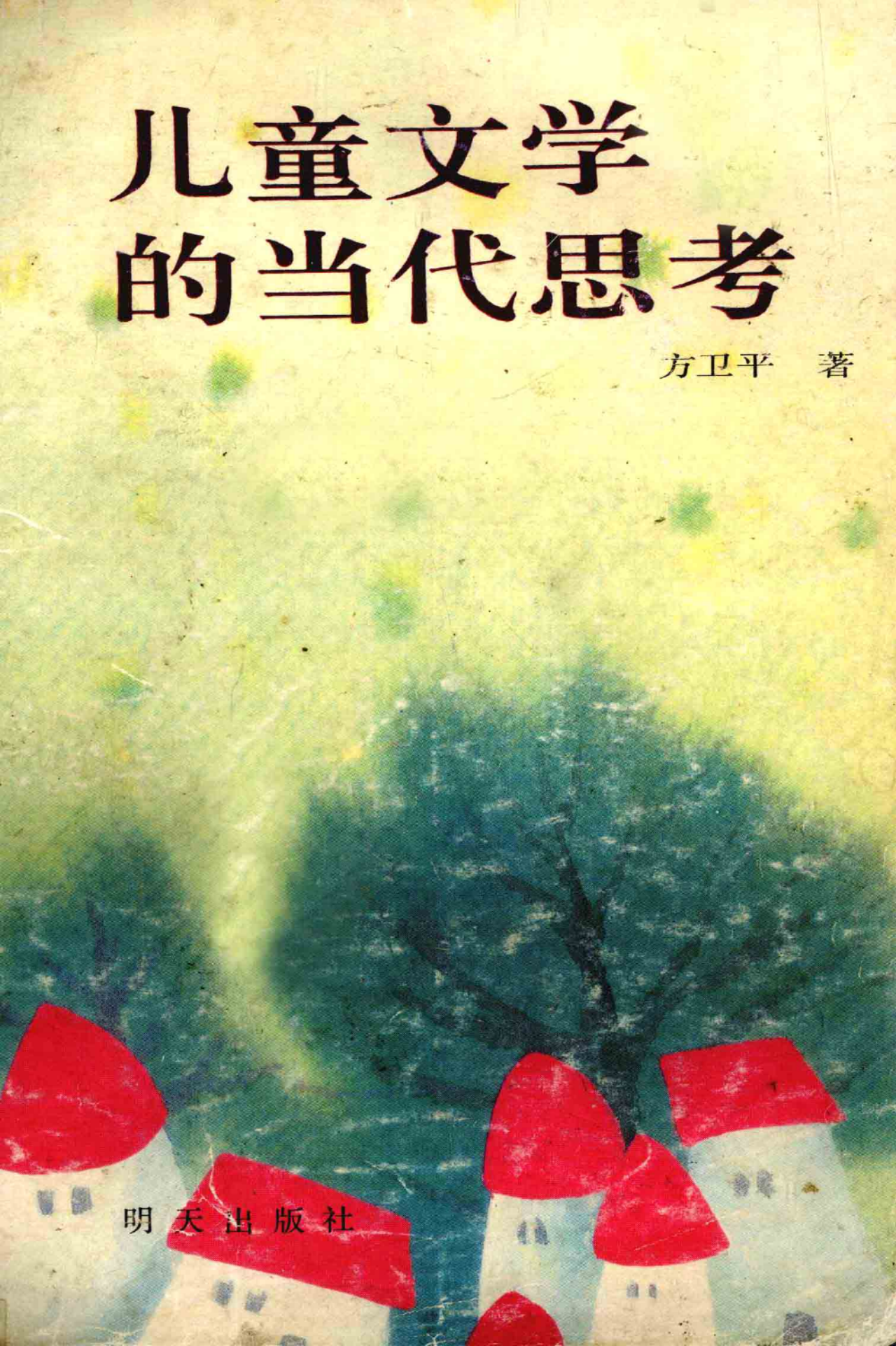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 的当代思考

方卫平 著



明天出版社

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

方 卫 平

明 天 出 版 社

1997 年 • 济南

鲁新登字 06 号

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

方卫平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30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32—1881—7
1·366 定价:7.50 元

目 录

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现状的初步考察.....	(1)
略谈开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心理研究	(16)
试谈茅盾的儿童文学评论	(19)
理论的迷误与理论的建设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历史描述	(30)
幼儿文学的理论自觉	
——评《幼儿文学 ABC》	(43)
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48)
儿童文学批评史：观念与方法	(67)
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	(84)
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	(90)
童话的立体结构与创新.....	(102)
儿童文学：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	(105)
儿童文学本体观的倾斜及其重建.....	(109)
儿童文学文本结构分析.....	(125)
论儿童审美心理建构对儿童文学文本构成	
形态的影响.....	(135)
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143)

略论儿童文学的深度及其实现方式·····	(156)
儿童文学在当代艺术文化中的位置·····	(160)
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	(170)
近年来儿童文学对成人文学的借鉴意识·····	(189)
少年小说：对新的艺术可能的探寻·····	(201)
少年文学的自觉与困惑	
——兼及《独船》及其讨论·····	(215)
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之我见	
——兼与陈伯吹先生商榷·····	(225)
九十年代：长篇的时代？·····	(234)
走向新的艺术常态	
——《我们没有表》、《六年级大逃亡》读后·····	(236)
1990：少年小说的艺术风度·····	(241)
憧憬博大	
——对一种儿童文学现象的描述和思考·····	(250)
冰波童话的情绪变调·····	(262)
常新港的艺术世界·····	(268)
《灰颜色白影子》的意义·····	(276)
栩栩如生的寓言形象	
——读严文井的《会摇尾巴的狼》·····	(281)
不露声色 引入荒谬	
——读艾青的《画鸟的猎人》·····	(286)
批评的品格	
——序周晓《少年小说论评》·····	(290)

序《雨雨寓言集》	(298)
拉丁美洲儿童小说论片	(301)
不安分的少年读者	(311)
中学生：一种阅读现实的报告	(314)
后记	(328)

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现状的初步考察

一

对儿童文学研究现状的议论和抱怨早已不是什么私下里的秘密了。可是，当我们试图对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现状进行一番考察以便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它们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贴近现象本身使我们难以取得一个宏观的视野，考察结果的可靠性预先就被打上了问号。然而尽管如此，对历史的透视将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现实提供某种可能性。我们十分明白，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现实不过是这一动态过程因果链中的一环，它诉说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于是在我们看来，现实并不应当成为阻止我们把视线投向历史的屏障，至少在主观上，我们对现实的考察应该力求保持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那么，当“诗言志说”唱出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第一个音符以后，当一千四百多年前刘勰书写出光照千秋的巨著《文心雕龙》的时候，人们可曾对儿童文学发表过什么高明的见解？如果带着这样的疑问去翻阅四大卷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或者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我们将会感到失望：不必说取精用弘的巨制，即便是零星的片言只语，也难以寻觅。李卓

吾的“童心说”令我们感到眼熟耳热，却并非直接论述儿童文学。李氏说得很明白：“夫童心者，真心也。”他是针对当时华而不实、虚假失真的创作倾向乃发此说的。

当然，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论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关于童谣起源的“荧惑星”（即金星）之说，也能够找到类似吕得胜的《小儿语序》那样的文字，但这些东西或流于荒诞谬误，或失之粗浅简陋，远远未能构成一种完整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形态。

毫无疑问，任何理论形态的形成都不能离开现实为之提供的客观材料，换句话说，一旦某种现实要求和呼唤人们从理论上予以概括和说明时，理论的诞生就具备了客观的现实前提。而在我国古代，儿童文学理论却从未获得过这种前提。这首先是因为封建时代囿于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桎梏的冰冷严酷的“儿童观”扼杀了儿童的独立人格，于是，儿童文学在儿童精神生活中应有的位置被取消了。我们并不否认，古代不幸的儿童们曾经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过补偿性的儿童文学的滋养。但是仅此而已，儿童文学并没有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品不旺，遑论研究！结果，我们在古代儿童文学理论的沙滩上，终于难以拾到美丽耀眼的贝壳。

十九世纪后半叶，绵延数千年的我国封建社会专制保守的精神文化系统受到猛烈冲击，中国文化意识的封建根基开始松动，依附于这种封建文化意识的无视儿童独立人格的儿童观逐渐解体。显然，儿童观的变更在促成我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一代文人学士为儿童文学奔走呼吁，创作身体力行；梁启超、黄遵宪、吴趼人、周桂笙、曾志忞、林纾、李叔同、沈心工等人，都曾为儿童文学事

业立下了草创之功。^①在倡导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同时，理论思维的羽翼展开了。被认为是最早从事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梁启超以及徐念慈等人，为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贡献了第一批砖瓦。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译印政治小说序》等著述中，谈论了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戏剧（当时称为“学校剧”）等体裁的教育功能、艺术特征等问题，并且热情评介有关作品。徐念慈则在《余之小说观》的“小说今后之改良”方案中提出：“今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形式，则华而近朴，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积较寻常者稍小。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其价值，则极廉，数不逾角。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②这里不仅明确倡导要为“高等小学以下”的学生“专出一种小说”，而且还具体论述了这种小说在形式、体裁、文字、插图、旨趣、价格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从史的角度看，这些论述无疑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

但是，晚清有关儿童文学的论述仍然属于理论形态的准备阶段。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库恩曾经在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的科学革命模式，以反对累进式的科学发展模式。在他看来，科学理论是按照“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样的模式不断发展的。当一门知识尚处于众说纷纭而未形成系统理论的准备阶段时，它还只是处于前科学阶段。一旦构成了系统的理论，它就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如果借用库恩的说法，那么可以说儿童文学理

论在晚清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无庸讳言，晚清的儿童文学研究并未形成多么气势磅礴的宏大音响，它们只是象沉沉黑夜中的一声呐喊。当然，也正是作为一声呐喊，十九世纪的先声在二十世纪得到了有力的回响。

我们看到，一踏进新世纪的门槛，儿童文学就加快了它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正如许多人都承认的那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我国是五四前后才大量涌现的。伴随着这一进程，儿童文学理论也在时代的襁褓中迅速成长起来。周作人、鲁迅、茅盾、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严既澄等人在儿童文学理论园地奋力开拓，功勋卓著，他们的有关著述几乎涉及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举凡儿童文学的地位、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儿童文学的特征和艺术规律、儿童文学的作家论、体裁论、儿童文学的批评和阅读指导、儿童文学的传统遗产等等，都进入了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视野。大批儿童文学理论著述问世。据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五四以后出版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和论文集有三十余种，其中光是以《儿童文学概论》为书名的专著不下五种，单篇的论文就更多了。这些著述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以最早出现的魏寿镛、周侯于编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23 年初版，1924 年二版，1930 年三版）为例，该书凡六章，标题分别是：“一、什么叫做儿童文学”；“二、儿童有没有文学的需要”；“三、儿童文学的要素”；“四、儿童文学的来源”；“五、儿童文学的分类”；“六、儿童文学的教学法”（据第三版）。尽管该书论述简略，但人们不难从这些标题中发现作者构筑初具规模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意图。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已经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

如果再深究一步，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树状模式：一种是以儿童本位心理为主干的树状理论模式，其理论枝桠都生长在儿童本位心理这一主干上，我们姑且称之为单茎形树状理论模式；一种是以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为主干的树状理论模式，其理论枝桠都生长在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这两大主干上，我们姑且称之为双茎形树状理论模式。这两种理论模式都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前者由于忽视了儿童心理和儿童文学的社会性因素而暴露了致命的缺陷，另一方面，它仍然以其具有合理性的理论内核给后者以有力的支持和补充。

二

纵观历史能够使我们获得一个考察现实的参照系，当然特别重要的还是对现实本身的观察。

建国初期，沐浴着共和国早晨的阳光，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幼苗迅速成长。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模式已经不适应文学实践的发展要求，建设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新体系的要求历史地摆到了人们面前。这也许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理论的第一次科学危机。

结果，我们又逐渐有了当代儿童文学的树状理论模式。这里用了“逐渐”一词，是因为这一模式的基本构架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奠定，而直到八十年代初才以“概论”的形式得以最后完成。这一树状理论模式的两大主干是强调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和儿童年龄特征对儿童文学的特殊要求。我们隐约感觉到，它与现代双茎形树状理论模式似乎存在着某种联

系。

但是实际上，与其说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理论模式是纵向继承现代儿童文学模式的产物，还不如说它是横向移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结果更恰当些（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当然也受到过苏联的一些影响，这里暂且不论）。五十年代，我们曾经翻译、出版了大量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和论文，其中专著和论文集就不下十五种。特别是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和集子，几乎都是从苏联翻译的。如伊林的《论儿童的科学读物》（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 年版），《苏联儿童文学论文集》第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4 年版）、格列奇什尼科娃的《苏联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年版），密德魏杰娃的《高尔基论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年版）等，都是当时很有份量和影响的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因此，正象成人文学理论曾经全盘接受了苏联文学理论体系一样，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也几乎是从苏联的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例如作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两大主干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说”和“儿童年龄特征说”，便是照搬了苏联的理论。特·考尔聂奇克在《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一文中就说过：“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是在于它具有教育的方向性，在于照顾少年读者的年龄特点，照顾少年儿童心理机能的特殊性，在于要求用艺术的方法根据马列主义关于青年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的学说来培育（丰富）并指导青年一代。”^⑧事实上，这些论述几十年来一直是我们的不容置疑的理论信条，规定着当代儿童文学的基本观念和理论框架。

然而文学实践决不会因为理论的权威性而改变自己生动活泼的性格，恰恰相反，文学现象总是以其瞬息万变的面貌不断

向试图“以不变应万变”的凝固的理论模式发出挑战。人们发现，就在当代儿童文学理论为自己的结构框架终于形成而庆幸的时候，它与活跃的儿童文学现象之间的断层也同时形成了。儿童文学理论的新的常规科学刚一建立，新的科学危机就跟踪而至，人们甚至得不到喘息的机会！

的确，儿童文学正要求理论作出机敏的反应和深刻的思辨，然而理论却未能报以有效的感应。理论自身的凝聚力维护着现有的体系，使人们难以冲出它的规范；当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错位时，人们便陷入“理论痛苦”的磨难之中。当代有责任心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正在承受着这种痛苦的折磨。那么，摆在人们面前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现实？且让我们抛弃“说忧先报喜”的常见程序，直接面对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 畸形的研究格局。

儿童文学研究理应由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评论三部分组成。研究儿童文学史，开展儿童文学评论，对于建立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科学的儿童文学理论，又能够为史的研究、评论的展开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正如韦勒克、沃伦说的那样：“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④因此，这三个部分应该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以构成正常合理的研究格局。

然而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多年以来，

我们对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很不重视，研究力量极为薄弱。有的同志以反对学院式研究为理由，轻视甚至蔑视基本理论建设，满足于随感而发、零敲碎打，致使我们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感极为贫弱，缺乏应有的思辨色彩；而作为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感极为贫弱，缺乏应有的思辨色彩；而作为儿童文学研究另一分支的儿童文学史，更是没有很好地得到系统的研究，其标志之一便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一部自己编写的儿童文学史——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通史，或是断代史。结果，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些基本课题至今仍是悬案。例如，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儿童文学？如果有，又有哪些遗产？由于没有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缺乏一部（更不必说多部）有史有识、史论结合的儿童文学史专著，人们对此一直缺乏明晰的认识，这就影响了我们对我国儿童文学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儿童文学评论工作似乎稍为景气，但实际上也存在着内部比例失调的问题。例如，正象有些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十分缺乏胸襟开阔、立意不凡而又扎扎实实的着眼于宏观研究的评论文章，而书评式的、就事论事的评论文字却垂手可得，随处可见。这种畸形的研究格局，使儿童文学研究的三大组成部分难以彼此支持、和谐发展。与成人文学研究相对平衡的研究格局比较起来，儿童文学研究就更显出它的不协调了。

2. 缺乏独特的理论发现和研究个性。

人们经常对儿童文学研究缺乏独特的理论发现和研究个性表示不满，认为儿童文学理论不过是成人文学理论的不算高明的“翻版”。这种抱怨听起来十分刺耳，却多少表现了正视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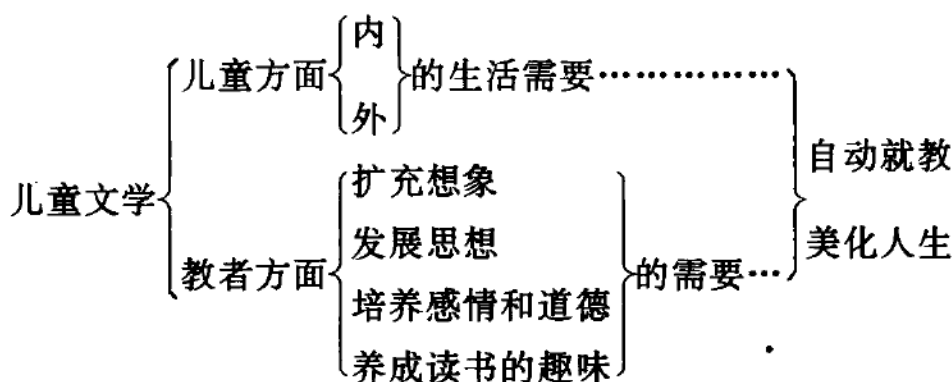
的勇气。的确，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缺乏自己的理论发现和建树，又很少有自己的理论用语，我们的研究个性也终于消失在成人文学理论的神圣的折光中了。

所以会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开辟出自己的研究天地。例如，儿童文学的创作心理应该是我们驰骋的研究天地。从心理的动态因素来看，儿童文学的接受者——儿童的心理结构正处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与成人的心理结构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当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成人（当然也有儿童自己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情况，但这属于极小概率，可以忽略不计）进入创作过程时，这种时间差必然要通过心理时间的调整得到缩短，以使作家的创作心境逼近儿童的心灵。这是一种奇妙的、不同于成人文学创作的心理转换与组合，也正是需要我们加以研究的现象。但是，我们却从过去的成人文学理论那里搬来了“思想+生活+技巧”的呆板公式，除了再发一些诸如“要熟悉儿童心理”（这当然不错）之类的议论外，我们竟没有进行更多一些的理论探索！留下了一片理论研究的处女地，同时也失去了理论发现的机会，失去了自己的研究个性。

3. 静止、凝固的理论模式。

缺乏自己的理论发现，缺乏创造和发展，结果，我国当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模式一直处于静止的凝固的状态。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总体构架和基本观念存在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贯制”，它甚至没有比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向前迈出应该迈出的步伐。我们不妨仍以魏寿镛、周侯于编著的《儿童文学概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该书在第二章谈儿童

对文学的需要时，曾列表如下：



除剔去了“自动就教”的说法（这一剔除的合理性令人怀疑），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教育作用”以外，我们对这个问题就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发展了——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如此。

理论模式的稳定性本身也许并不是一桩坏事。问题在于，这种稳定性应该是随着现实的不断流动，通过变异和发展，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建立新的平衡来获得的，而决不能借助保守、盲从的意识或得过且过的心理来维护。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模式的“稳定性”便是如此：它对儿童文学现象的感应极为迟钝粗糙，既缺乏对现实的跟踪和评断，更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和预言，如前所述，评论往往只是运用既有理论模式和陈旧观念的就事论事。理论一旦与创作实践脱节，不能回答创作中提出的问题，不能给创作以切实有效的指导，它本身就只能是一堆毫无生气、毫无益处的僵死教条。

更为严重的是，静止、凝固的理论模式给人们的思维带来了巨大的惰性。很显然，传统的理论模式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几乎与变异绝缘，带有强烈的保守性。

4. 狭窄的理论视野与单一的研究方法。

今天，科学研究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把对象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爱因斯坦心爱的简单性思想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已经日趋下降^⑤。这正如著名学者普里高津指出的那样：“科学今天所经历着的变化导致一种全新的局面。科学的兴趣正从简单性向着复杂性转变。”^⑥同时，不同学科之间的彼此渗透和科学成果的相互利用也已成为科学研究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固守一隅的单打一的方式越来越同时代的要求相扞格，在文学研究领域，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文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而力求开拓理论视野，丰富研究方法。苏联美学家莫·萨·卡冈就认为：“不管怎样，现在已经可以完全确切地断言，艺术活动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因此对它的研究不仅允许、而且无可争议地要求一系列科学的努力。”^⑦然而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人们似乎是不屑（或者是无暇？无力？）顾及井外发生的一切，理论视野十分狭窄。我们很少从诸如心理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这样的学科中去汲取新鲜的理论滋养，更不曾向其它自然科学伸过手，而宁愿盯着眼前的那一小块天地自我陶醉、厮守度日。殊不知这更加剧了儿童文学理论的“贫血症”。研究方法的单一化也是如此。特别是当整个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掀起更新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巨大浪潮的时候，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仍如一个“平静的港湾”的现状，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and 不能忍受了。

凝固的理论模式使我们形成了保守的思维定势；狭窄的理论视野与单一的研究方法则使我们更习惯于封闭型思维，而不善于进行扩散型思维。于是，我们的思维触角难以向广阔的思